

英敛之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

侯杰 秦方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作为《大公报》和辅仁大学的创办人，英敛之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转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一位爱国的天主教徒，他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在海内外学术界尚缺乏必要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对这样一位历史奇人的生命历程展开一番探讨。

一

英敛之(1866—1926年)名华，号安蹇、安蹇斋主，又号万松野人。赫佳氏，满洲正红旗人。他家世寒微，为获得一份粮饷自小学武。1873年，英敛之接受启蒙教育，后弃武从文，钻研百家，浏览稗史，能文章，工书法。

由于接触到天主教的宣教品，英敛之对西方宗教有所了解，并于1888年皈依了天主教，后在北京西堂工作。1895年，他和出身于皇族的爱新觉罗·淑仲结为连理。后其妻亦信奉天主教。

在维新运动中，英敛之大力支持并声援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爱国举动。1898年4月，在《论兴利必先除弊》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康主政有为胶州疏内‘蔽于耳目，狃于旧说’诸语，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1]此外，他还大胆引用北京流传的政治歌谣：“皇上是傻子，王爷是架子，官是搂子，兵是苦子”，对晚清官场进行了抨击。戊戌政变后，因怕受株连离开北京，在乘船赴上海的途中，他碰巧遇到亡命路上的康有为。他先后到过香港、上海等地，耳闻目睹了民众在专制统治下的种种惨状，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处境更为同情，对戊戌变法惨遭镇压“感痛郁结情不能已”。1899年，他在《知新报》上发表《党祸余言》，坦陈政见。

1901年初，英敛之回到天津。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总管柴天宠表示甘愿赔足股本万元，请他办报。8月，他拜访北京教区樊国梁主教“请示定

夺”。樊主教不仅自己要入股，就连法国公使鲍登也愿意入股。

为办报，英敛之往返于京津沪等地，忙着选定社址，购买机器，物色主笔。当时各报馆普遍采取主笔制，所有编务都由主笔负责。他请求马相伯、张元济、朱志尧等人帮忙物色、推荐主笔。最后接受汪康年的举荐，聘方守六为第一位主笔。实际上，英敛之付出的努力更多，除了负责经营报纸外，还要总理报纸的言论，许多重要言论都出自他手笔。尽管后来又先后聘请了很多人担任或代理《大公报》主笔，但他多是一身兼任总理、撰述、编辑等数职，总揽报纸的言论权和报馆的经营权。创办《大公报》成为英敛之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二

1902年6月17日，经天主教北京总主教的批准，由天津紫竹林教堂出资，在天津法租界狄总领事路(Rue Dillon，又名六号路乙，即今天津哈尔滨道42号)上，由严复题写报头的《大公报》(法文名字为“L'Impartial”为无私之意)正式出版发行。初出一大张，成书本式，用中国毛边纸印刷，仅有一面。就是这份并不张扬的报纸却表现出很高的品位，体现着英敛之的办报理念。他以“英华”之名，在创刊号上刊发了《大公报序》，明确其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具体说来就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故本报断不敢存自是之心，刚愎自用；亦不敢取流俗之悦，颠倒是非。总期有益于国是民依，有裨于人心学术。”并且声明办报者“尤望海内有道，时加训诲，匡其不逮，以光我报章，以开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偿焉，鄙人之心慰已。”^[2]因此，《大公报》赢得了读

者。一创刊,该报就发行了3800份。次日,他又在《大公报出版弁言》中阐明:“今本报但循泰东西报馆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4]

《大公报》比较重视新闻评论、时事分析,因此,《论说》、《来函》、《来函代论》、《译件》、《附件》、《中外近事》、《时事要闻》等栏目较有特色且占大量篇幅。而新闻、各地通信等稍显逊色。前者注意官场的风云变幻,尤其是“上谕”和各衙门发布的告示;后者以汇编上海报纸新闻为主。该报还不时传递一些消息出来,像慈禧太后如何召见王公大臣,怎样骂人和处理军政大事。这对于深受愚民政策之苦的读者来说起到了增长见闻的作用。

《大公报》在英敛之的主持下以敢言闻名,“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因为大胆评论时政,反对慈禧太后,拥护光绪皇帝,报纸的销量不断上升,两个月后便增加到5000份。他积极宣传君主立宪,要求慈禧太后归政,把管理国家的权力交还给光绪皇帝。他甚至在1902年6月21日发表《论归政之利》,宣传慈禧太后归政,于国于民皆有好处:“归政则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他指出由于后党中的刚毅、荣禄等人,千方百计地阻挠归政,担心归政后会失去政治靠山,于是以慈禧太后为孤注,使之骑虎难下。此文一出,令读者多感惊叹。

英敛之一直认为光绪皇帝是位贤明君主,因此每年在其生日那天,必在《大公报》上刊登贺词。1903年8月5日,他在报头旁刊登了十分醒目的祝词:“恭贺大清国大皇帝万寿圣节: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宪法早立,国祚绵长。本馆敬祝。”另发表题为《本日庆贺万寿之感情》的论说,提出不论是途人还是孺子,齐声赞颂当今皇上,在文章中又借别人之口,把光绪皇帝比做中国的明治、大彼得。实际上,他主张变法是寄希望于中国发现和使用人才,力行变法,实行君主立宪。由于身处社会转型时期,发现某些人只偏重于表面维新,不重视内心变革,因此,他大声疾呼要提高政治道德,并撰写了《非变法之为难,实变心之为难》一文。

他还积极宣传新思想,以不署撰稿人姓名等方式,在《大公报》上转载梁启超的文章。这在戊戌党禁尚未解除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大胆的举动。此外,他还刊载过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的署名文章,以传播近代新思潮。1903年,他刊发了一篇

名为《论立宪之要素》的论说,主张中国应当仿效英国、日本确立君主立宪政体,实行立宪。“世界无开通而不成立之国,世界亦即无不开通而可成立之国。无他,开通不开通之征,一视诸宪法成立不成立,而即以观国家之成立不成立。宪法不立,则虽其国强盛,终滋危殆之忧,如今日之俄土是;宪法苟立,则虽其国狭小,已固雄富之基,如今日之德日是。若是者,知宪法之与国家诚所谓不可一日或离者。”^[5]

在1905年4月13日《大公报》举办的千号纪念征文中,他出的征文题目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中国若亡是无地理说”,并把一等奖给予了认为“君主立宪者,政体之完全无缺者也”的文章作者。在1908年2月10日举行的两千号纪念征文中,他确定的征文题目是《实行立宪之政体如何?》。在1910年11月30日举办的《大公报》三千号纪念征文中,他选定的题目仍然是《立宪国之要素一曰国会,一曰宪法,然当预备立宪之时,究应先开国会而后宪法欤,抑应先颁宪法而后开国会欤?》。由此可见,君主立宪可以说是他的一贯主张,历次重要纪念活动都离不开对君主立宪的宣传,各种介绍、宣传君主立宪的文字也不断出现在《大公报》上。他不太赞成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来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遂发表了一些指责革命党人的行为有拂于民情的言论。

可是,他对于清政府采取残暴手段迫害、杀戮革命党人的做法也非常反感。1907年,当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等人受到清政府残害时,他同情受害人,不满统治者的立场非常鲜明。7月30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大胆抨击清政府残害徐锡麟,迫害秋瑾的野蛮行径,同情为理想献身的仁人志士。他曾担心国内排满情绪的高涨及带来的混乱会给外国侵略势力提供可乘之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是他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清政府与外国侵略势力紧密勾结,要想解决中国问题,革命不失为有效的手段之一。

他在《大公报》以抗官而不做官,不厕身官场,不同流合污而赢得广泛的赞颂。严复就曾赠给他一副对联:“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1903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向外国侵略势力出卖东三省及内蒙古等地的一些主权,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新闻记者沈葆得到有关情况后,不顾个人安危,在报纸上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

行径,天下顿时哗然。对此,清政府十分恼怒,气急败坏地要把沈荇捕杀。对此,他给予了极大地关注,对1903年7月17日沈荇在北京被捕以及7月31日被惨无人道地杖毙于刑部的全过程进行了报道。沈荇死后,《大公报》还发表了他的绝命词四章。其中最后一章有云:

“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
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

《大公报》不仅详细报道了这位志士所遭受的惨无人道之酷刑,而且反映了各界人士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清政府的野蛮行径,即使中国人震惊,也使“西人闻之皆胆寒”。一个月后,各国公使夫人觐见慈禧皇太后时仍表示出对此事的强烈不满。

他凭借着“无冕之王”的特殊地位,对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也予以猛烈抨击和责难。1905年5月,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虐待华工,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曾少卿等人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他恰巧正在日本游历,7月2日返回天津后,积极支持和推动已经风靡全国的抵制美货运动。8月16日,袁世凯罗织出“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封闭《大公报》馆。因为《大公报》馆地处法租界,袁世凯气急败坏地命令租界外禁邮、禁阅《大公报》。8月17日,他和主笔刘孟扬在一版头条位置,通栏加花边发表联名启事“特白”,抗议袁世凯的无理举动:“抵制美约一事,倡于上海,各省风应,凡华字报纸无一无之,敝报当仁岂能独让?故随诸君子后,亦尽国民一分之天职。诚以此举关系中国前途者既远且大也。今不幸敝报独触当局之怒,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为不封之封。”同日,他还发表署名文章《说官》,痛骂不可一世的高官大吏。此后数日,他不仅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大字广告,而且不断发表论说,据理力争。更为可贵的是,他不顾禁令,继续出版发售《大公报》。结果,“被禁之时期,而售报转增”^[6]。袁世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把《大公报》主笔刘孟扬拉入警界,任天津南段巡警局的值日所课长兼警察局局长。可是,这并不能阻止英敛之对袁的批评。

对于某些官员的所作所为,他也履行了舆论监督之责,经常发表文章给予评说。1909年7月19日发表了《异哉,某相国》一文,矛头直指权倾一时的张之洞:“历仕三朝身负天之重望,而其所私心忿恨,日日落井下石者乃在党人。党人何负于阁下必如是以倾陷耶?党人得志之时,阁下如何交际之,党人失败以后,阁下如何倾轧之?假令八年以后宪

政风行,党人群起效用,恐阁下虽可为专制时代之功臣,亦不免为立宪时代之罪人矣。”

因为他勇于抨击官僚政客,前后长达十年之久,所以赢得“敢言”的美誉。

争取新闻自由,提倡新闻道德,主张言论自由,是《大公报》追求的目标。因此,他深深地感到,从业者的素质十分重要。他们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技能外,还要有较强的敬业精神,更要有较高的素养、品德。报人一定要有独立思想和人格,为社会提供正当的言论,同时也需要改变人们对报纸的刻板印象。他发表的《说报》一文,着重讨论了这个问题。当然,中国的报业从业者在生存和发展中,也面临着种种困难和压力。他借《某大员设计倾陷报馆之苦心》一文,揭露了报业与官府的矛盾,痛斥某些官员居心险恶。实际上,他不仅确立了一系列的办报思想和理念,而且在新闻实践中不断地付诸行动。这一传统得到《大公报》后来者们的继承和发扬。

三

英敛之还在《大公报》上鼓吹白话文,为推进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积极提倡白话文以开通民智,自创刊之日起,便成为白话文的有力提倡者和鼓吹者。他在创刊号上开设《附件》栏,专门以口语化程度很高的白话来探讨各种问题,向读者灌输科学知识,进行品德教育,倡导移风易俗。他先是经常性地刊登白话论说,后来改为每日随报附赠白话专版。从1905年8月21日起,定期出版白话附张,以《敝帚千金》之名,免费随报附送,另有单张出售。此外,他还把《附件》栏发表的文章分门别类,如开智、辟邪、合群、劝诫缠足等,汇编成书,以同样的名字出版发行。

他深受严译《天演论》的影响,坚信“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道理。面对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局势,他不时发表文章,揭示中国已处于劣势和国民劣根性,有亡国灭种之虞,以刺激中国人猛醒。同时又让国人坚信:只要努力奋斗,优劣是可以转换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903年3月,他先后发表了《国民文明野蛮之界说》等篇文章,4月,又刊登了《说自立》,8月12日,在《附件》中又刊登了一篇名为《说中国之坏》的文章,列举了种种坏风俗,而“第一样是奴性”。

他十分注重社会风俗的改良,倡导剪辫易服。为了引领这一潮流,早在1903年1月15日就刊发了《征文广告》,借举办征文活动,推动新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3月15日,将第一名朱志父所撰写的《剪辫易服说》发表,呼吁毁除旧制,剪辫易服,以从欧俗。此外,他还积极报道有关剪辫易服的情况。如有些留学生已经剪辫,回国后,影响到周围的人。1904年9月,舆论界盛传朝廷允许剪辫,练兵处要仿外国军服式样改变中国军服,“依照日本剪发易服”。结果提议遭到否决,只好令士兵把发辫盘在军帽中。但是,他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提倡剪辫易服,及时报道了相关情况及人们观念的变化,使人们意识到“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剪辫易服的实行,得益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而他和《大公报》居功至伟。

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女子缠足的进步主张。该报出版的第一天就刊发了一篇题为《戒缠足说》的白话文章,明确地举起了向这一危害中国亿万妇女一千多年的恶习陋俗宣战的旗帜。此后,他坚持不懈地提倡女子放足。除了做舆论方面的宣传,启发普通民众的智识外,他还不断地探讨禁绝缠足这一恶习陋俗的有效手段和方法,曾参与发起成立了天足会。

他还大力宣传新式婚姻,反对纳妾。1902年6月26日,刊发了一则求偶广告:“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毋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请即邮寄亲笔复函,若在外埠能附寄大照或玉照更妙。信面写‘AAA’托天津大公报馆或青年会二处代收。”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对于新式婚俗的建立,无疑是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同时,他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各界反对纳妾情绪的潜滋暗长,及时地反映了这种民意并表明自己的立场。1909年7月30日,他写到:“近来天津宦场中人有以二千元而纳妾者,有以六千元而纳妾者,有以二万元而纳妾者,纳妾之风愈盛,而妾之价值亦愈高。于是天津市面乃发现一种奇特之广告,大书禁止纳妾四字。此禁令之命意虽不知果何指,亦不知出于何人,然使本于社会公共之要求,亦足以触目惊心为世炯戒。”

他一直以推介西方文明为职志,因此大力宣传

新婚俗,为社会风习的改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1910年10月,立宪运动著名活动家徐佛苏在天津举行西式婚礼,他作为媒人,首先发表演说:“夫妇之道,最重爱情。有此真精神以固结于其间,则百年和合,永无反目之虞。我国数千年来,婚姻一事,专听父母之命及媒妁之言,其祸之烈,不可胜言。西国结婚,所以必讲自由者,职是之故。且我国结婚一事,繁文缛节,虚浮滥费,举皆无益。”为了宣传这一观点,他还把这篇演说词发表在10月17日的《大公报》上。

他主张兴办实业,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早在1903年1月3日,就刊发论说《书颜观察世清请设劝工场禀告》,鼓励发展近代工商业。同年9月13日,又发表了名为《中国宜广设工艺厂说》的论说,很有见地指出:“居今日言行新政,第一先从实业上作起,其余一切皆后也。”这就是“实业救国论”的一种表达。

他很早就接触到最先在西方国家游荡的社会主义,并且在1903年3月31日发表的《二十世纪之新主义》一文中,进行了专门论说。此外,他还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实况进行过一些评介,报道了西方文化、娱乐形式在中国的出现。1904年4月17日,报道了坐落在英租界内的戈登堂经常不断地上演外国新戏的消息。刚刚传入中国的电影更成为了人们一种高雅的娱乐形式。1906年,天津最早的电影院开始放映新片,大受观众欢迎。评剧,在清末多次被天津地方当局以“有伤风化,永干力禁”为由在华界禁演。他偏偏于1908年8月1日报道了评剧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等地上演的情况,“大张旗鼓,日夜演唱,男女入围观剧者拥挤异常”。

1912年2月23日,《大公报》改印“中华民国”的年号,同时刊登了一个告白,告知读者:“本馆总理英敛之外出,赐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接连数日,报纸上都刊登了同一个广告,宣告他逐渐从《大公报》中隐退了。

四

从《大公报》逐渐退隐后,英敛之更加关注中国天主教文化教育以及赈灾等社会慈善、公益事业。1912年3月,雷鸣远司铎在天津创办《广益录》,他作发刊词(一说任主笔)。同年9月20日,与马相伯合撰《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要求在中国开设教会大学。

1913年,他退居香山敬宜园,创办了辅仁社,向天主教中的子弟传授知识和天主教教理。1915年8月,重印《主制群征》,并亲自作序。年底,袁世凯预备称帝,有些天主教报纸发表了附和称帝丑行的文字,他极为愤慨给予严厉斥责。从1915年6月10日起,《大公报》重刊汤若望所著《主制群征》,他为之作序。11月25日,连载《天学初函》中的《辩学遗牍》,12月4日,刊登他的《万松野人言善录》。从1916年1月27日起,刊登《大西利先生玛竇传》。这些书还出版过单行本,为中国天主教历史、文化的传扬做出切实的努力。

英敛之既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更是一位强烈的爱国者。1916年,天津老西开事件发生,他站在中国民众的立场上,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扩充租界。1917年6月,撰写《劝学罪言》,劝教民研究中国学问,以便真正做到爱教爱国,曾在教会内引起极大的震动。某些外国传教士对他发出警告,中国天主教徒内部也发生分歧,多数人表示同情,也有人不以为然。有一位南方朋友甚至来信,劝他不应该指责皇上之罪,要谦逊、忍耐、听神长之命。对此,他不为所动,坚持己见,撰写《复友人驳〈劝学罪言〉书》。

为了复兴天主教文风,他还影印出版了故宫档案中的《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由于披露出当年康熙皇帝咒骂天主教士以及禁止在中国传教的内容,惹得北京西什库天主教教堂大为不满。他不仅失去了支持,还受到重罚,甚至连到教堂来望弥撒的权利也被剥夺了。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既爱教,又爱国,堪称“豪杰之士”。

为了救灾民于水火,他一次次奉献出爱心。1917年,直隶发生水灾,他接受担任赈灾督办熊希龄的聘请,在北京二龙坑设立慈幼局并任局长。他不顾身体有病,勉力从事,一干就是八个多月,直到身体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才回到静宜园。1920年春,慈幼局改名慈幼院,迁移到香山,他辞去此职。

1924年,已经年近60岁的他不顾年老体弱,与马相伯一起筹备建立公教大学,即辅仁大学的前身,辅仁社为其附属机构。1925年8月,拟定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简章,辅仁社又名国学专修科,专为教会弟子而设,他任主任。10月10日开学,18日上课,他亲自为23名学生授课。在筹备公教大学的过程中,他曾陷入一场官司,后来经过罗马教廷的裁定,只许可公教大学办学,不许可其传

教。11月,题教宗禁约曰:“教宗禁约一通,康熙谕旨一道,系清室善后委员会由南三所康熙朱批旧档中检出。兹特依照原影复出,以供众览。”

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不幸逝世。3月2日,由罗马教廷发来“圣大额我略骑尉勋章”(Knight of the Order of Saint Gregory the Great),以表彰他为中国天主教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这个勋章是由罗马教廷驻中国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在其生前申请的。而他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更应该为有志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后人所铭记。

他著有《万松野人言善录》、《也是集》、《也是集续编》、《劝学罪言》、《安蹇斋丛残稿》。

【收稿日期】2003年7月

【作者简介】侯杰,男,1962年,天津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心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宗教史和民众宗教意识等研究。

秦方,女,1980年,徐州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社会性别史。

【责任编辑:蔡世华】

参考文献:

- [1] 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 [2] 方豪编:《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版。
- [3]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
- [4] 1902年6月18日《大公报》。
- [5] 1903年11月3日《大公报》。
- [6] 1908年1月21日《大公报》。
- [7] 周雨:《大公报史1912—194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 [8]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 [9] 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1994年。
- [10] 刘纳编著:《吕碧城评传·作品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
- [11] 《〈大公报〉一百年》上册,香港大公报社,2002年。
- [12] 《也是集续编》,天津大公报馆宣统年刊。
- [13] 《也是集》,天津大公报馆光绪年刊。
- [14]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
- [15] 梁永生:《三重文化身份的融合:中国现代历史行程中的英家三代》,《儒耶对话新里程》,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1年。

英敛之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

作者: [侯杰](#), [秦方](#)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刊名: [历史教学](#) PKU CSSCI
英文刊名: [HISTORY TEACHING](#)
年, 卷(期): 2003, ""(9)
被引用次数: 2次

参考文献(15条)

1. [王芸生](#), [曹谷冰](#) [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
2. [方豪](#) [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 1974
3. [查看详情](#) 1902
4. [查看详情](#) 1902
5. [查看详情](#) 1903
6. [查看详情](#) 1908
7. [周雨](#) [大公报史1912-1949](#) 1993
8. [刘志琴](#)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 1998
9. [吴廷俊](#) [新记大公报史稿](#) 1994
10. [刘纳](#) [吕碧城评传·作品选](#) 1998
11. [〈大公报〉一百年](#) 2002
12. [也是集续编](#)
13. [也是集](#)
14. [李孝悌](#)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 1998
15. [梁元生](#) [三重文化身份的融合:中国现代历史行程中的英家三代](#) 2001

引证文献(2条)

1. [姜海龙](#) [图文互观与晚清知识分子民众启蒙思想表达——以《醒俗画报》为中心](#)[学位论文]硕士 2005
2. [林绪武](#) [白话文与清末的开民智和开女智——以天津《大公报》白话文为中心](#)[学位论文]硕士 2005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sjsx200309013.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85c932cc-a781-42f9-93d1-9e4d007bedac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